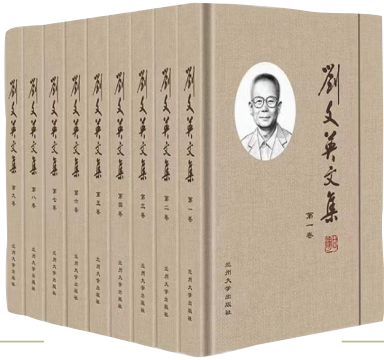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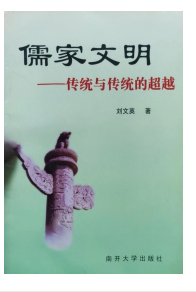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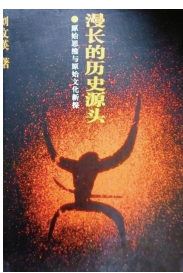
寻梦研心 探本溯源

——刘文英先生学术思想侧记

卢兴 张瀚桐



刘文英先生的文集及部分学术著作



刘文英先生是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期到本世纪初期南开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学术带头人。他学养深厚、涉猎广博，在中国古代哲学、原始思维、中国古代梦文化等诸多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理论贡献，在海内外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

刘文英先生1939年2月出生于陕西乾县。读中学时，他偶然了解到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哲学产生浓厚的兴趣，开始阅读哲学书籍并逐步确立了人生方向。1957年，他考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沉潜涵泳于经典文献和名师教泽，并且时常去聆听冯友兰等校外专家的讲座。正是得益于大学期间奠定的扎实功底，他在此后的学术生涯中得以融汇中西、贯通古今，且具有以问题为中心的跨学科研究视野。

1962年，刘文英先生大学毕业后，响应号召赴兰州大学任教，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在教学之余，他追踪哲学前沿问题研究，对辩证逻辑颇有兴趣，能够熟练阅读俄语哲学理论著作并可笔译，德语、英语也达到一定水平。两年后，他在《哲学译丛》上发表了《关于意识研究的几个问题》等三篇译文，体现出对于人类意识、思维、精神等哲学元问题的关注。在学术研究无法开展的岁月里，他依然保持着对屈原《天问》的思考，等到改革开放的春风刚刚吹拂之时，他的新一篇学术论文发表于1978年的《文史哲》杂志上，题目即是《奇特而深邃的哲理诗——关于屈原的“天问”》。同时，他对于专业术语进行了多语种的溯源工作，并向文字学前辈虚心求教以充盈学养，这也为他日后从事根源性的研究工作筑牢了坚实的学术功底。

改革开放以后，刘文英先生的学

术和思想逐渐走向成熟。1980年，他出版了第一部学术专著《中国古代时空观念的产生和发展》（2000年修订本更名为《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在这本书中，先生自觉而熟练地运用了溯源的研究方法，不断追问思想的最初样态与产生原因。他在该书修订版自序中总结其特点在于：“不以人物和著作为中心，也不以某个历史阶段为限制，而是把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作为一个专题，由流溯源，再由源及流，系统考察这种观念的源流变化、发生发展，以及它所包含和所涉及的诸方面。”刘先生对于中国古人的时空观念，先考察从何而来，再探索如何而去，这种“溯源及流”的方法使得他的研究更为系统全面。他说：“就观念的溯源而言，现代西方称之为‘发生学方法’。在我看来，这是中国传统学术固有的一种方法。”他不仅在个人治学中频繁而纯熟地运用这一方法，还在教学育人的过程中系统地讲授这种方法，以培养学生的溯源意识。5年后，刘先生又出版了《中国古代意识观念的产生和发展》一书，从外在的时空观念转向内在的意识观念，对人类最为精微的精神世界展开探索。

刘文英先生这种“追本溯源”的问题意识和研究方法，助他步入充满魅力且少有问津的“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领域。这一拓荒性的研究异常艰难，要求研究者具备众多学科的专业知识，涉及人类学、民族学、民俗学、古文字学、历史语言学、古代天文历法、考古学、神话学等诸多领域，这些知识对于哲学专业出身的研究者来说，都需要通过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来获得。刘先生自改革开放之初便开始了这一领域的探索，他将自己埋入如山似海的生僻材料之中，极深研

几，探赜索隐，逐渐体贴出自己的一家之言，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始思维研究新体系。他积20余年心力凝聚而成90万字的专著《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于199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正如王生平先生的评价，这本书“标志着中国学人在这个领域已初步结束了西方学者的一统天下，开始了中西对话推陈出新的历程”。刘先生之所以能够数十年如一日探索人类思维之源头，是因为他心中有着强烈的溯源意识，渴求为“人类的道德规范起源何处”“人类的科学知识和哲学思想如何产生”等重大问题提供根基稳固、脉络清晰的答案。他在该书“自序”中写道：“本书不是介绍西方某个学者或学派的工作，也不是对他们的理论、观点做注解。而是站在一个中国人的立场上，用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眼光，来阐述一个中国人的特殊看法。不是个别问题上，而是一系列重大问题及整体上的特殊看法。”如今，当后学翻阅刘先生的这些文字时，依旧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透出来的中国学人的理论自信，为世界学术界全面深入地理解人类思维起源问题提供了中国古代的思想文本和中国现代学者的独到见解。刘先生的学术贡献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评价，《漫长的历史源头》一书于1998年获教育部“全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哲学类一等奖。

刘文英先生在研究原始思维的过程中，尤其对其中关于“梦”的部分深感兴趣，早在1982年他便开始酝酿此方面的研究。7年后，刘先生出版了《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一个侧面》，该书上编“中国古代的占梦迷信”系统性整理了中国古代占梦的种类与方法；下编“中国古代对梦的探索”抽丝剥茧地勾勒出隐藏在“迷信”名下的中国古人对梦的科学认识；外编“现代世界梦说的进展”系统性地比较东西方梦说，并且提出崭新的梦说理论。刘先生坚持：“应当

把现代世界梦说的成就同中国古代梦说的精华结合起来，同时用东方人和西方人的双重眼光，去审视人类精神的这种特殊现象。”基于这种理解，他的著作打破了西方梦学理论的垄断，并将研究心得凝练为第四章“一个中国人的新梦说”。这部书的问世产生了重要影响，钱学森先生主动写信向刘先生致意：“写这封信是为了向您表示敬意！因为您解答了精神学的一个根本问题……研究方法超过前人，完全正确……是有中国特色的，是中国人的胜利！”自此以后，刘先生就成了“追梦人”，先后写就《中国古代的梦书》（1990）、《星占与梦占》（1993）、《精神系统与新梦说》（1998）、《梦与中国文化》（2003）等专著，这些著作共同构建了一套富于中国特色的“新梦说”和精神分析理论体系，打破了西方弗洛伊德梦学思想一统天下的理论格局，对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原始思维与梦学的研究之外，刘文英先生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众多领域也颇有建树。他撰写了《韩非评传》（1976）、《王符评传》（1993）、《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1999）等专著，发表了近百篇学术论文，主编了《简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1986）、《中国哲学史》（2002）、《中国哲学史史料学》（2002）等重点教材以及《哲学百科小辞典》（1987）。他还培养了众多学生，对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的中国哲学学科建设作出巨大贡献。他曾荣获宝钢优秀教师奖、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指导教师奖、天津市特等劳模和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

刘文英先生为学界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原创性科研成果。他淡泊名利、不慕浮华，在冷门绝学中沉潜探索，在思维学、精神学领域重新激活了中国传统的智慧，挺立了中华文化的主体性。翻开先生的论著不难发现，书中的每一个结论都有充分的史料作为论据，旁征博引不拘学科，但终以哲学思维把握经纬，问题意识集中而敏锐。对于晚生后学而言，或许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未必能在刘先生所开辟的领域继续前行，但他探本溯源的问题意识和深造自得的治学精神，无疑将成为我们学术道路上的指引明灯。

（作者卢兴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张瀚桐系南开大学哲学院本科生）

学人小传

刘文英（1939—2005），陕西乾县人。哲学家、哲学史家、文化学家。1962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先后执教于兰州大学和南开大学，曾任兰州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哲学系主任，南开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著有《漫长的历史源头：原始思维与原始文化新探》《梦的迷信与梦的探索：中国古代宗教哲学和科学的一个侧面》《精神系统与新梦说》《梦与中国文化》《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中国古代的意识观念》《王符评传》《儒家文明：传统与传统的超越》等，主编教材《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等。其著作已整理成九卷本《刘文英文集》（约550万字），2021年由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

津沽学人

天津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天津日报

合办

近代天津的大家族不仅仅是财大气粗，社会影响深远，而且还是当时各种复杂因素的交叠之处。可以说，对当时的大家族有深入的了解，就能对近代天津的复杂状况有一个较为宏观的认知。在这方面，林希可谓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他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也有强烈的意愿书写这些大家族的辉煌与落寞。

在小说里，林希经常使用第一人称叙事，这个叙事者“我”，在故事里是侯家三爷的孙子，属于侯家正房，是整个侯家大院的掌门人。但有趣的是，他更喜欢写偏房侯七爷南院里的事，这便有了一个“正院视角”下的偏房故事，这种叙事姿态是很值得玩味的，里面是否暗含了作家的某种态度？因为这些偏房故事大多荒诞不经。比如《糊涂老太》，就是写南院主事的侯七老太因为年老，记忆力 and 判断力都有较为明显的衰退；侯七老太在子女管教方面同样充满了戏剧性，长子侯天成迷恋戏曲，不但写鼓词、在戏院挥霍无度，还娶了梅花大鼓女艺人，气得侯三爷将其驱离侯家大院，南院为侯天成买下一座公馆，但家里的曲听腻了，他又继续到戏院听京韵大鼓，花费更甚。次子侯宝成则是被叙述者用“吃喝嫖赌”四个字概括了其行径，并且毫无理由也在外面买了公馆。只有最小的儿子侯玉成踏实读书，考上了高等工科学校，但却令父母摇头，因其脱离了大户子弟惯常的轨迹。然而就是这个“非主流”的儿子，最终不但不会挥霍钱财，而且有稳定的收入和家庭。

写大家族，没有丰富的资料储备是不敢想象的。关于曲艺，林希自然是熟悉的，《糊涂老太》并不能完全展现其对曲艺的熟悉程度，《五先生》就更为充分一些。“五先生”正是“糊涂老太”的长子侯天成，堪称纨绔子弟的一个样板，虽然不务正业吃喝玩乐，却精通甚广，说戏、画戏剧人物和花样子、吹箫以及养花养鸟养蝓蚰，还能给报纸做写手，尤爱梅花大鼓，并且有较高的艺术修养和善良的品性。五先生是诸多人物形象中较少受到作者批判且寄予些许同情的一位，作者也通过五先生这一人物，观察到与之接触的众多小人物的反复与无奈。

《家贼》和《遛笼》将视角集中在了同样是南院的侯九爷家中。《家贼》里的侯九爷有两副面孔（或可说两重身份），一副是接近于军阀的行伍中人，另一副是流连莺鸟与女色的纨绔子弟，这第二重身份与

《林希自选集》新读（八）

书写大家族的兴衰荣辱

艾翔



沽上丛话

侯家大院相得益彰，第一重身份又让他与众人区别开来，同中有异，这便是林希小说引人入胜之处。侯九爷的两个儿子，侯辛之继承的是第二重身份，玩蝓蚰开销巨大，侯置之则被送到保定军官学校，认为这样能够保住侯家的地位和利益，未曾想刚到军营就以莫须有罪名被收监羁押。弟弟侯辛之带着家里的金条找到军阀贾弁璽，后者放出了侯置之。后来兄弟二人因志不同道不合，上演了兄弟相残的一幕。家风混乱，人心不古，大家族成了当时社会的缩影。

《遛笼》和《善人坊》这两部中篇小说，可以看作一枚硬币的两面，分别用正写和反写勾勒出大家族的形态。侯九爷先后拥有了一只翡翠鸟和一対芙蓉子凤，爱不释手，不惜重金购买了极为奢侈的手工鸟笼来匹配三只鸟，从中获得极大满足。不巧的是，即使如此昂贵的鸟笼也没能留住这三只鸟，这给侯九爷造成了极大的内心伤害，他失魂落魄地独自提笼进树林，幻想高贵品种的鸟自投罗网。这是一出无伤大雅的纨绔子弟的滑稽戏，并不沉重，却引人深思。《善人坊》写侯三爷为了给侯家延续好名声，处心积虑做“善事”，想为家族争得一座善人坊。可“善事”做遍，总是差一些火候。经家中老人用吴三代提醒，侯三爷得知还需要找常闲人买通当官。不料常闲人贪得无厌，先后让自己的女儿、妻子和老母扮演贫民求财，被揭发后才为侯家立坊。整篇小说虽然都在讲主角“行善积德”的努力，但不断牵扯出的见闻暗示了“善举”背后的社会现实，即一个腐朽的旧社会。在这样的旧社会里，无论是家族还是个人独善其身的难度，都被作者直截了当地呈现出来。

大家族书写，最能反映社会百态，也最考验作家的创作功力。林希在这一领域勤奋且精心耕耘，取得的成绩显而易见，他的作品展示了旧天津的丰富驳杂，以文学的形式呈现了另一种社会记录。



峡江帆影（中国画）
赵士英

上太平街初级小学是我的启蒙地，学校不大，位于上太平街与福胜街毗连处，离我家不出二百米。上学时，每天经过街上的店铺门口，望得最多，跑得最勤、印象最深的要数南货店“惠来兴”。听街上老人们讲，“惠来兴”是民国初年的老店，公私合营后旧貌换新颜。整条街的南货业数它规模最大、品种齐、花色新——秘制橄榄，香气浓郁，浑身乌亮，嚼劲厚醇；灯芯糕，条子均匀，刚柔顺爽，爽口清心；酥心饼，油质淳润，色泽金黄，味甜鲜嫩。拆零的香烟，切碎的槟榔，样样有，还有白糖盐醋藕。它给街坊邻居带来不少方便，也予年少的我们许多欢欣时刻。

记得当时“惠来兴”有一年轻女营业员姓王，小孩子叫她王小姨；另一年纪稍长的男营业员姓李，我们唤他李大伯。王小姨长相端正，朴实大方，麻利认真；李大伯身体微胖，和蔼可亲。他们对顾客都很热情，但做派套路截然不同。

有一次我在王小姨手上称五毛钱太妃糖，她抓了大把糖粒往秤盘上一丢，我看有这么多，心里蛮喜欢。她望下秤连忙拿走三五颗，我心立马紧一阵。再称，她又去掉一两颗，我心中凉一分。随着秤杆的摆动，最后她又悄悄拣下一颗，那一刻我心情很不好。李大伯就不同，有天正黄昏，外婆做肉饼，吩咐我去称两毛钱的胡椒饼，我兴冲冲跑到“惠来兴”，上气不接下气。碰到李大伯称秤，他往秤盘上铺张纸，夹了几片胡椒饼轻轻摆好放当中。他瞥下秤，添了三五片纸，这时我已舒了口气。再望，他又加了三二片，这下我高兴了。李大伯娴熟纸打包邮时，顺手又添了片饼说：“这张纸打了秤，还要补一片。”兴许肉里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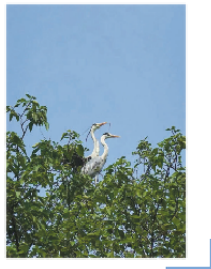
拂晓，总是在动听悦耳的鸟语中揭开帷幕。我，也几乎每天都能在这唧唧啾啾的天籁中惬意恬愉地醒来。哦，什么时候，不同声部的鸟的奏鸣竟抵挡了机动车的喧嚣，使我们现代城市人也能分享孟浩然那“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的神妙诗境了呢？

儿时最早认识的鸟儿应该是麻雀。上小学的那一年刚好赶上“除四害、讲卫生”运动，麻雀与老鼠、苍蝇、蚊子同被列为“四害”。学校的广播说麻雀是农作物的大敌，它们在农田里啄偷谷粒、小麦，农民伯伯用汗水为我们种出的稻麦竟被白白地抢食夺吃。班主任布置的家庭作业就有帮家长 and 邻居驱赶麻雀这一项，是我们见了麻雀就敲锅敲盆惊跑它们，同学张铁栓曾目睹无处落脚不停飞的麻雀从天上掉下来过。会做木工活儿的同学周国栋自制了一把弹弓，说借我打几天麻雀，还抓给我一把自制的干泥丸权当“子弹”。怎料一场大雨把我裤子口袋里的“子弹”淋成泥糊，射雀的梦也随之泡汤。见课本上有用筛子扣麻雀的插图，便又学。没有筛子，用拴了长绳的筷子支脸盆，脸盆下撒点儿馒头渣，待麻雀飞来吃大餐，一扯绳子就能盆扣麻雀。可叹，馒头渣从未有异动，麻雀不露头，空悲切。

不过，我终于在八年后退了麻雀这一仇。那是15岁到河西走廊农建部队拓荒后的事情。我作为七连二排四班班长，奉命带全班跟着连长到团部种子库装卸小麦籽种。我们将筛选好的麦种装进麻袋，再背起近二百斤重的麻包，踏着钢板将其码垛至高处。多数人将麻包背在背上，用双手在头的两侧紧紧抓住上边的两个角，或从下面用力托住。而我当时个头儿虽高却极瘦，像根细麻秆儿，麻包刚一压到背上便两腿抖颤，感觉身体马上就会断折，麻包便很危险地从后背溜至后腰。危急中用大腿竭力撑住，麻包竟稳稳地固定在后膀上了，我用右臂夹着

鸣啾唧啾

阎晓明



麻包沿跳板奇迹般的向上攀去，居然阴差阳错引得全班一片叫好：“单臂夹包上跳板，果然身大力不亏！”码好第一只麻包后，突然看到一群麻雀从内山墙顶端的洞巢飞落到种子堆中，不仅在我们面前“大快朵颐”，相互间还“啁啾咕咕”。望着它们旁若无人和“得意忘形”的样子，想着我们为选种累得要死的艰辛，儿时一场场失败的驱雀战、弹弓战、扣盆战又仿佛重现眼前。

当团部广播站的收工号响起时，连长将库房钥匙交给我，命我次日继续带全班来此装卸。我注意到库内刚好有两把梯子，于是，暗暗决定对雀儿们打一场反击战。当晚，我和三名战士披着月色赶回库房，在内山墙两侧各竖一梯。两名战士在其中一侧堵住雀巢洞口；我攀至另一侧洞口，右手执手电筒照亮雀巢，戴了手套的左手伸进窝洞去掏，每掏一只麻雀就向下递给拿着大布兜的战士。连窝端后，又用旧报纸将两边洞口塞严，防止麻雀再来筑巢偷吃……

上世纪90年代初我调回天津时，国家刚好将“爱鸟周”活动以法规形式确定下来。通过每年4月1日国际“爱鸟日”和4月第3周天津“爱鸟周”的科普宣传，我才知道，麻雀的身份竟然实现了华丽转身，已从“四害”变成了“三有”。“三有”保护动物即2000年国家林业局发布的简称称为“三有名录”的《国家保护的有益的或者具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中的保护动物。麻雀在控制害虫、种子传播、维持食物链平衡稳定、增添生态活力等方面对自然生态有益，同时也是生态系统的指示物种，所以名列其中，受到保护。受到保护的麻雀早已无需“担忧”被驱赶的危险、弹弓的威胁、扣筛的陷阱。如今，走在街头，它们会在你脚下蹦蹦跳跳地觅食；漫步林间，它们会在树冠间叽叽喳喳地欢语；宅在家中，它们也会找上门来，落脚阳台、蹬着小眼，好奇地与你隔窗相望。它们自由自在地享受着春风、阳光、美食，以及与人友好相伴的时日，真的回归为“愉悦”“欢欣”的喻体，化身为了“欢呼雀跃”“兔起鹊跃”“雀跃而游”“拈髯雀跃”等成语中生动的精灵。

搜寻“三有名录”，又发现了沙鸡和原鸽，它们至今仍为城市里难得一见的鸟纲物种，而我却曾有缘窥其一斑。犹记大漠拓荒岁月，每逢轮到牧驼，我常仰卧于被烈日晒得发烫的戈壁壁，将身体摆成一个“大字”，一边照看骆驼，一边听小蜥蜴在耳边爬行发出窸窣窣窣的声响。经常的，空中会有一种“沙沙沙”的响声仿佛呼啸着自远而近，接着，一大群频扇翅膀的鸟儿从头顶上方疾风般掠过。在这“鸟不拉屎”的悲凉之地，能惊现如此壮美的鸟群超低空飞行，也不失为大戈壁上一道耀眼的奇观了。它们，便是毛腿沙鸡。听老职工说，沙鸡傻得很，只知急飞，不懂避障，常常撞落在水泥电杆下，捡回来烧了吃，非常美味。列入“三有名录”后的沙鸡当然不可能再做野味美食，但愿它们尽快提升智商，不要再向着水泥电杆“以头抢地”了。

当时，原鸽也曾被当作餐桌美味来着。原鸽，就是野鸽，一说是家鸽的祖先。麦收时节，我们下河清农场的麦场就会落下百十来只野鸽，咕咕叫着乐享粮食丰收的盛宴。我们制作了很多麦草人，也养了守护麦垛的狗，但假人真狗都奈何不了它们，鸽子们依然“故我”，埋头聚餐。某日，卫生队的一位队员端来一碗红烧野鸽，我特奇怪：“靠什么诀窍捉了这么多？”他诡谲一笑：“在麦粒儿里拌了点儿安眠药，它们一睡，我们就收。”现今谁还敢捕、谁还想吃？2022年，南方某地三人用气枪、夜间照明等设备打下10只野鸽，三人犯非法狩猎罪，分别判处拘役4至6个月不等刑期，赔偿生态损害损失3000元。

随着“依法保护鸟类，建设美丽中国”爱鸟护鸟意识的普遍树立和提高，原先难得一见的鸟儿也都出现了。在北京上班时，有一年夏日常去菖蒲河看野鸭带着身后一串鸭仔戏游，鸭队两侧的水面被它们划出一道人字形的波纹，缓缓铺开，每到冬季，又会漫步于家乡海河之滨观赏白色候鸟，有的展翅空中，有的栖息水上，还有极小的雏鸟三五成群地练习游泳。最惊喜的是，一次在津河边的灌木丛中，竟奇遇一只美丽的戴胜，头上仿佛戴着一顶在生态保护战中赢得胜利的桂冠。

因为爱鸟，开始为各种鸟鸣录音，鸣啾唧啾中，有的粗犷，有的婉转，有的低吟，有的高歌；花香鸟语里，白头翁清脆的鸣叫像在高唤着三音节的“今晚月”，还有一对鸟儿则似相互问答：“讲不讲？”“讲也讲不清！”因为爱鸟，愿在树荫下和草坪间的道路上与鸟相伴，伸展双臂学鸟儿飞翔，并拢双腿学喜鹊跳跃，快走急行学白鹤踱步（鲁迅先生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将白鹤鸚鵡称作“张飞鸟”，不仅因其黑脸白颊像极张飞的京剧脸谱，也因其有张飞那般暴躁的性格）。因为爱鸟，也常去河滨湖畔看美丽的白鹭，看它伫立石端的优雅，看它小憩枝头的惬意，看它展翅凌空的抖擞，看它捕食水边的谐趣，有一天还目睹了“一行白鹭上青天”的诗境景象。

又是一个拂晓，鸟儿们又开始活泼泼地唱了，我也又在这唧唧啾啾的绝妙乐曲中醒来……

了胡椒饼，外婆做的肉饼格外香嫩，三扒两嚼，鼓眼一吞，那顿晚饭吃得过瘾。稍后更事，我觉得王小姨并没少我的秤，李大伯也没有多我的饼，倒是他后添的那一片，公道赚人心。

有一年临近春节，“惠来兴”忙不停，店里临时请了一个姓万的年轻人来帮忙。大人上“惠来兴”办年货，小孩在店里想着新年快乐。对门的“四毛”、隔壁的“柱子”和我家是“铁三角”，三人一起商量如何过个热闹年。“柱子”买了捆冲天炮；“四毛”买了把转珠连；我准备了长挂鞭炮两千响，小心翼翼将它拆成了单个。资源整合后，大家扯平均，约好年三十晚上守岁玩个通宵。吃完团圆饭相聚“惠来兴”，三人衣裤兜鼓囊囊的，好生得意。此时“惠来兴”鲜有顾客，略显清静。玩鞭炮需要火，“柱子”“四毛”各叼一纸烟，我老爸只吹“喇叭筒”（手卷的纸烟），家里也没有纸烟存货，我只好准备了买火柴的二分钱。“四毛”耳朵上还夹了香盘，见状将它递给了我。三人在附近架起炉，焰火闪鞭炮鸣，烟雾腾腾年味儿浓浓。玩在兴致上，烟屁股熄了火，想买烟钱不够，我心里打转转，招呼都没打，一溜烟跑到“惠来兴”，只见万哥准备打烊上木板，我急忙挤进去买火柴，等他转身去拿货，我慌忙在前面柜台摸了三根散烟，香烟火柴到手，转身就走。找到“柱子”“四毛”，忙将手中的烟每人分一根，当时他俩蛮高兴，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过程。过后细思量，总觉得心里不对劲。

一晃数十年，“惠来兴”的货架上至今还放置着我们少时的草率和粗忽，她的温馨与公允仍在心室里原封未动，而那个曾经青涩莽撞的少年没再见识过那样的人和事。

惠来兴



刘松林